

中国符号学丛书

丛书主编

唐小林

赵毅衡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无论怎样界定「文化」，

这一概念都是对群体性符号意义的表达，

因此天然地带有社会属性。

社会文化必然牵涉到来自符号学方法的解读。

社会文化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s of Culture

张碧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符号学丛书 ○ 丛书主编 唐小林 赵毅衡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无论怎样界定「文化」，

这一概念都是对群体性符号意义的表达，

因此天然地带有社会属性。

社会文化必然牵涉到来自符号学方法的解读。

社会文化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s of Culture

张碧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宋 颖
责任编辑:蒋姗姗
责任校对:张伊伊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文化符号学 / 张碧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12

(中国符号学丛书 / 唐小林, 赵毅衡主编)

ISBN 978-7-5614-8265-0

I. ①社… II. ①张… III. ①文化社会学—符号学—研究 IV. ①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4298 号

书名 社会文化符号学

著 者	张 碧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265-0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13.2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导 言	(1)
上编：原始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	(7)
第一章 语言苑囿中的徘徊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10)
第二章 文化与符号：克利福德·格尔茨	(25)
第三章 “符号森林”的守护人：维克多·特纳	(40)
第四章 结构与历史：马歇尔·萨林斯	(53)
下编：现代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	(58)
第一章 心理学视域的社会符号学：乔治·米德	(59)
第二章 现代社会文化符码的破解：罗兰·巴尔特	(63)
第三章 社会的符号学体系建构：于尔根·哈贝马斯	(84)
第四章 作为符号学的狂欢理论	(92)
第五章 语言学的社会文化隐喻：罗伯特·霍奇与君特·克雷斯	(108)
第六章 社会文化符号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约翰·菲斯克	(122)
第七章 传媒符号学	(153)
第八章 亚文化的符号学分析	(182)
结语：作为人文学科的符号学	(199)
参考文献	(201)

导 言

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符号学算不得一门新近的学科。据考证，早在古希腊时期，作为知识的符号学便初具雏形。此后，自中世纪延伸至近代，符号学一直在以不同称谓发展着自身的理论体系。^①

然而相对于 20 世纪之前打着不同“符号学”名义的诸多符号学，现代符号学在技术操作乃至精神旨趣等层面，都与之存在较大差异。学者赵毅衡经过对现代符号学诸多支系的梳理，认为现代符号学主要存在四条发展脉络。^②当然，符号学是一个如此包罗万象的学术领域，以至于与之发生交集的学科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社会符号学”这一术语在符号学领域内，并不令人感到陌生。社会学科的科学化始自 18 世纪，孔多塞 (Marquis de Condorcet) 在其《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中，对科学在政治学科中所具有的作用进行了强调，而自从孔德 (Auguste Comte) 的实证主义学说获得普遍重视后，科学就更成为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恰如孔德在定义“社会学”这一术语时所言，“社会学应当是一门研究‘社会的自然科学’”^③。同时，自 19 世纪以来，“文化”成为现代意义上社会学所瞩目的重要领域，西方学界开始以科学研究的方式对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及诸特性进行全方位的审视。由于符号学在文化分析方面的先天优势，因此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这种研究的重要方法论。西方学者戈特蒂涅与拉格普罗曾将社会符号学称为“对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的唯物主义分析”^④，社会符号学的考察范畴集中于社会意识形态，而文化则是蕴

① 详见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总论”中“符号学思想史”一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1~15 页。

③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版，第 7 页。

④ 转引自安迪·兰德维尔、保罗·科布利：《社会符号学》，载于保罗·科布利编《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周劲松、赵毅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32 页。

藏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因此，社会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出发，对社会文化进行符号学分析的学科。从较为宽泛的角度讲，如果将所有人类社会的集体意识都归为“文化”范畴，那么社会符号学便应被称为“社会文化符号学”。

当然，任何意义的表达都必须通过符号媒介才能实现，而建基于科学性表述的现代学科则必须通过对本学科诸多概念、符号的建构和运用，才能得到有效的清晰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学科都与符号息息相关。即使对于以调查、收集和归纳作为基本方法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而言，对符号的运用同样是极为必要的研究途径。这便是问题所在：作为人类社会行为及意识的表意集合，“文化”无法如经济领域的实体因素那样能够显见地获得精确的考察与定位，以科学方法来探究和把握文化的整体生成及微观变化，便显得较为吃力；“在符号分析中，从数据搜集阶段逃避日常生活以及符号消费研究必须的语用视角也不容易”。我们不否认数据统计在社会文化研究（例如伯明翰学派的某些研究方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更多情况下，符号学作为社会学家的分析工具，其目的更多地集中于对社会文化本身的符号意义的阐发，而与其数量没有太多关系，“因为在符号研究中，附着在符号运用中的‘语境’应是阐释的重要向导”^①，换言之，对社会文化进行符号学研究，更应从形成社会对象意义的语境出发，探究其生成的文化机制和可能对受众施加的心理影响。

将符号学运用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对于现代社会学科而言，是一种实践尝试。在这方面，许多西方社会学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讨。本书所致力的工作，便主要是对将符号学融于社会学的学者们的符号学实践进行梳理和阐释。

社会文化符号学绝非是一门在封闭状态中前行的学科，而是一个不断吸收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理论的开放性领域。英国符号学家保罗·科布利（Pual Cobley）将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分为以下几种：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由莫斯科—由塔尔图符号学派领衔的“文化符号学”、文化人类学、语用学，以及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占据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等等。^② 这几种学科传统，都对社会符号学的发展予以了不可估量的支持。

① 安迪·兰德维尔、保罗·科布利：《社会符号学》，第132页。

② 安迪·兰德维尔、保罗·科布利：《社会符号学》，第134~146页。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索绪尔所开创的语言学模式的符号学几乎成了符号学的代名词，这种说法固然以偏概全，却也从一定程度体现出此一支系曾经所具有的重要性。众所周知，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作为语言学家，开创了与传统历时性语言学所分庭抗礼的“共时性”语言学研究模式。作为语言研究模式，共时性理论对俄国形式主义、此后的布拉格学派及哥本哈根学派都给予了极大影响。作为俄国形式主义代表的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与蒂尼亚诺夫（Yury Tynjanov），即明确了索绪尔语言学的一系列概念——如共时/历时、语言/言语对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思想的影响。^①在此后发表的一系列文学批评文章中，雅各布森多以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体现出极为明显的符号学倾向。

就语言学传统符号学延展至其他人文学科领域而言，雅各布森所起到的传承作用相当重要，正是他的帮助和引领，促使索绪尔语言学对列维-斯特劳斯（Lévis-Strauss）结构人类学思想的形成产生极大影响，使列维-斯特劳斯由此将符号学运用于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分析当中。在对待血缘关系的组成结构上，列维-斯特劳斯所采取的二元对立结构划分方式，可谓是对索绪尔结构观的忠实实践。然而，结构主义符号学因其采取的共时性考察维度所带来的封闭性缺陷，使得自身的发展受到极大局限，并很快被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从理论内部突破而形成后结构主义这样一种全新的理论形态，同时也宣告了结构主义的寿终正寝。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路径在运用至较小规模的社群时，也许尚有用武之地，可一旦被用至范围更大且变幻莫测的社会文化领域时，其局限性便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巴尔特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对社会文化的符号学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巴尔特曾是另一位明确将索绪尔语言学运用于社会文化分析中的批评家，这在其早年的“零度写作”“形象的修辞”等论述中便有所体现，然而随着其思想的发展，巴尔特后期的一系列符号学实践，例如《恋人絮语》《文之悦》等作品都带上了明显的后结构主义色彩，其“神话学”思想则实际上正是后结构主义思想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实践标志。

相对于索绪尔语言学传统，皮尔斯（Charles Peirce）符号学传统得到

^① 蒂尼亚诺夫、雅各布森：《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载于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现代符号学界的认识相对较晚，在这一点上，与巴赫金符号学十分相似。然而，由于索绪尔语言学众所周知的缺陷，皮尔斯符号学逐渐成为当代符号学的显学，乃至主要的符号学支系。客观地讲，由于对英美符号学价值的发掘相对较晚，因此这一支系对其他社会学科领域的影响似乎尚未全面展开。但这并不能否定皮尔斯符号学对于社会文化批评的价值，正如科布利所说，“皮尔士（Charles Peirce，本文译作：皮尔斯）对符号有着更具唯物主义性质的理解，认为符号是表现在他三元体的‘对象’要素之中的。对于致力于社会符号学的那些人类学方向的学者而言，这有着潜在的好处”^①。皮尔斯对符号类型的划分，使社会文化学界，尤其是现代传媒领域受惠颇深。现代媒体途径的多元化发展，使得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突破了电话、电报、报纸等传统信息途径，而更多地从视觉角度来获取信息。电视、互联网甚至广告、手机，都成为当代最新型的媒介传达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视觉媒介便成为主流媒介形式。所谓当代社会的“视觉转向”，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因此，社会文化学界十分偏重以皮尔斯的“像似符”概念来分析社会文化对象。皮尔斯符号学的影响的持续深入，使其必将成为社会文化分析领域最为重要的符号学支系之一。

巴赫金（Mikhail Bahkin）曾是一位长期受到西方学界忽视的符号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由于同为成长于斯拉夫语系国家的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等学者的推介，巴赫金在西方学界引起轰动，其一系列符号学思想使得西方学者，尤其是符号学家十分震惊。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澳大利亚学者多克尔（John Docker）提出将巴赫金符号学援引至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后，这一符号学支系便对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英语文化研究界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在于通过对文化现象的符号学分析，来考察隐藏于表象之下的意识形态乃至社会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巴赫金符号学理论，对种种跨阶层文化现象进行民主式的解释，不难看出，这一派符号学支系带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气息。

文化人类学是社会文化符号学中的另一重要支系。从文化人类学的重要代表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开始，人类学便倾向于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审视文化现象，即“越来越强调把文化现象作为个体（或社群）所表述的社会符号系统来描述，这导致了与文化人类学中的认知潮流相关联的各种

^① 安迪·兰德维尔、保罗·科布利：《社会符号学》，第134页。

文化分析流派的勃兴”^①，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就是在这种大的学科认知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列维-斯特劳斯从索绪尔语言学传统中获得启发，认为在社群人员集体的无意识领域中，存在某种类似于索绪尔所谓的“语言”的深层结构，并由此从数学逻辑出发，对由这一深层结构所可能衍生出的社会组织形式进行推演。列维-斯特劳斯对结构人类学理论的推动，使文化人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打上了深深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烙印。然而，随着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颠覆与超越，结构主义符号学在人类学领域的实践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几乎在同一时期，符号人类学在美国人类学界兴起，其代表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人。在这一派人类学家的符号学实践中，虽留有与列维-斯特劳斯不同程度的对话印迹，却无一例外地在符号学实践方面有着自身的体会。他们将文化理解为由一系列符号建立起来的符号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每个组成部分除了具有系统内部的符号意义外，还可能具有其他层面的意义，这便使得他们对符号学的理解超出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解范畴，从而具有了指向社会历史性的更为广泛的意义层次。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布利所提到的另一种基础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符号学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例如巴尔特的神话学批评，就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②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20世纪人文社科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深刻影响，因此诸多学科领域，其中包括大众文化领域的诸多学者，无论其本人是否承认自己明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称他们为“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多数人并未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基本认识论基础，某些认识甚至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例如列维-斯特劳斯，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决定性关系的认识，就基本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相反。从整体来看，这些学者的符号学方法基本是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很难被划为马克思主义传统范畴。

科布利所说的“语用学”，是从语言学派生出的一种符号学类型，其基本研究路径在于“致力于研究语言学中的主题或范畴，诸如话语中的前提和

① 安迪·兰德维尔、保罗·科布利：《社会符号学》，第137页。

② 安迪·兰德维尔、保罗·科布利：《社会符号学》，第142~143页。

‘原则’、互动性暗示、指代、礼貌、说话人角色、‘言语行为’和‘语境’，等等”，也因研究领域范围与社会语言学极为重合，而常被视为后者的分支。^① 语用学往往将考察视野置于对日常生活中人类普通言行的符号学透视之中，并以此作为基本视域，来探究隐藏于不同群体中的意识形态性质。可见，这一符号学支系带有鲜明的微观政治意味。

总之，社会文化符号学是一个庞大的学术领域，所涉及的学科、方法、研究对象甚至哲学背景也往往截然不同，但无论是其中哪种研究，皆无非是通过符号学途径来研究作为社会表意实践系统的文化，因此在这一原则上，它们应被统摄到同一个学术领域之中。

① 安迪·兰德维尔、保罗·科布利：《社会符号学》，第144页。

上编：原始社会文化研究的符号学实践

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现代意义的讨论，最早是由人类学领域发起的，这一点几乎已成公论。“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代表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其习得的行为模式、态度和物质材料的总和”^①，关于这一概念的内涵，文化人类学的阐释也最为多元和丰富。同时，在现代符号学兴起之时，也正是人类学最早意识到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的现代学术价值之时，并将其用于对原始文化的分析当中。

最早意识到符号学的价值并毅然决然地将其运用于人类学研究的，当属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他创造性地将索绪尔、特鲁别茨柯依及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运用至人类学领域，从而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学研究途径。随后，这一研究范式迅速跳出人类学领域，而被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广泛应用。然而，列维-斯特劳斯及其理论似乎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学界的批评，尤其是在德里达、后期的巴尔特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兴起后，这种批评甚至达到了顶峰；而人类学界内部对符号学的运用途径也随之走向了以意象解读为主要研究途径的传统符号学，并由此产生了以克利福德·格尔茨、维克多·特纳及马歇尔·萨林斯等美国学者为代表的“符号人类学”学派。当然，这种称呼只是按照学界惯例所采取的说法，从宽泛的意义来讲，列维-斯特劳斯当然也属于“符号人类学”。这样，本编拟对这些人类学家关于原始社会文化所进行的符号学分析过程进行考察与探讨。

语言学与人类学，是两个貌似全然不同的学科。前者是对语言的语音及结构等诸多方面的研究，而人类学则研究不同群体中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组织形式，并探讨在这一形成过程中所派生出的文化与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乍看起来，在语言学与人类学间建立联系，属于传统“历时性研究”的范畴，然而恰是在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依及雅各布森直接影响下的列维-

^① 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斯特劳斯，从共时性的角度，对两者间的关系作出了全新的解读与界定。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由于语言现象和人类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人类心理的体现，因此心理领域便成为联系两个截然不同学科之间的纽带。

列维-斯特劳斯的基本实践策略在于，将原始部落的社群组织划分为心理领域的“深层结构”（亦即 *langue*），以及以其为基本质料集合而派生出的各种社会组织形式——亦即“言语”（*parole*）或“表层结构”两个部分。这便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在人类学领域的基本实践方式。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这种研究方法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界显然受到了极大关注。但是，且不说列维-斯特劳斯的论敌，即使是在对其持某种支持态度的人类学家中，完全将结构主义方法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的人类学家，也甚是寥寥。无论是纯属人类学界的戈德里尔（Maurice Jodelrie）、身兼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身份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抑或属于社会学的戈尔德曼（Lucien Goldmann），都在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影响的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对列维-斯特劳斯甚至索绪尔本人的结构思想抱有微词或进行了抨击。难怪列维-斯特劳斯会大发感慨道：除他与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外，其他人都难被称为真正的结构主义者。

结构人类学是符号学在人类学中的一种实践形式，其基本致思路径，显然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方式相关，后面拟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思想进行专章探析，故此处不予重复赘言。结构人类学自始至终，几乎都由其代表列维-斯特劳斯独撑一面，而许多曾经是他盟友的人类学家，后来却无不在思想上离他而去，例如后文将谈到的符号人类学派。无论是格尔茨、特纳还是萨林斯，在其批评结构人类学的文字之外的其他论述中，我们都不难从其字里行阅读出他们与列维-斯特劳斯理论的复杂情感。此外，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同样属于结构主义的“叛逆者”。早年的布尔迪厄在进行符号学实践之初，曾援引索绪尔语言学传统作为其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受索绪尔系统概念以及二元对立方法的影响，并将其视为社会文化批评的基础。然而，与许多人类学家的思想发展趋势一样，布尔迪厄逐渐意识到索绪尔结构理论的巨大缺陷，并最终逐步放弃将结构主义理论作为其研究的方法论。在他看来，索绪尔语言学理路未将诸多历史因素考虑进去，而其采取的从所谓共时性维度去探究对象内在形式与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这种语言学秩序的确定是通过赋予语言的内在逻辑以特权才得以实现的，但同时这一做法付出的代价是忽视了语言的社会使用方面的社会条件

和相关因素。”^①“这种特殊的目标，即语言，是整体性的和不可分割的，在索绪尔的研究中，它是通过对其所有内部社会变量的排除而建构起来的。”^②索绪尔排斥社会因素的语言学思路，使以之为理论依据的结构人类学在分析社会现象时的认知性质大为削弱，对此，布尔迪厄逐渐开始具有了清醒的认识。

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结构主义的继承。此外，他甚至将对人类语言能力的“先天性”理解扩展到其他领域的的能力中，认为先天能力是“人性”的基本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那场震惊学界的对话中，乔姆斯基以其“先天观念”来诠释对人性的理解：“一个人如果通晓了一门语言，那你就掌握了这样的知识体系，因为他是带着非常清晰而详细的图式（schematism）开始学习语言的。”^③“这种来自本能的知识……使我们能够基于非常片面的信息而获得复杂的知识，我认为这是人性的一种基本品质。我认为是一种基本品质，因为语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交流中，而且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互动中。我认为，在人类智性的其他领域里，在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其他领域里，一定也存在着同样的品质。”^④这种理解，将“人性”视为各种先天而来的能力的总和，虽与康德的“先验范畴”概念不能相提并论，但显然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发挥。尽管乔姆斯基并非人类学家，但严格地讲，他试图通过与美国及法国结构主义藕断丝连的转换生成语法来阐释人的语言、行为能力的做法，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方法是有影响的。^⑤有不少学者对结构主义人类学理论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间的联系进行过深入探讨，诚如他们所言，受到笛卡尔先验思想影响的转换生成语法与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都具有封闭性及静态性特征，因此与其动态的理论倾向是决不可同日而语的，转换生成语法也因此与结构主义人

① 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② 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刘晖、褚思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③ 诺姆·乔姆斯基、迈克尔·福柯：《乔姆斯基、福柯辩论录》，刘玉红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④ 诺姆·乔姆斯基、迈克尔·福柯：《乔姆斯基、福柯辩论录》，第15页。

⑤ 罗伯特·墨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吴玫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类学一道，受到同时代西方学界的批评。^①

“符号人类学”学派与列维-斯特劳斯相比，其具体差异不仅体现为符号实践方式方面，同时，还在“是否可以建立一种具有涵盖性的人类社会观”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托多罗夫认为，列维-斯特劳斯试图以人类学方法，在寻找一种“达成某种思想和道德的普遍形式”，“提出一个常态化的问题：人类本质的普遍性”^②的同时，也认识到寻找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观点。^③同时，特纳在总结其“社会戏剧结构”时，将这一理论视为普遍适用于各民族社会发展的总体模式，这种观点明显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相对主义观念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出不同人类学家社会观的不同，也表现出他们关于符号表意领域的大相径庭的理解。

第一章 语言苑囿中的徘徊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如上所述，结构主义符号学在人类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既是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物，同时也是整个结构主义思潮中“正统结构主义”流派的代表；换言之，他所开创的结构人类学，成为整个思潮中最为“纯正”的结构主义学科，同时，也因其理论研究中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特征，而被视为将符号学运用于社会文化分析的专家。

一、对索绪尔语言学传统的运用

早年与雅各布森的结交，使得列维-斯特劳斯对语言学——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青睐有加，这在其代表作《结构人类学》中被反复提及。事实上，据列维-斯特劳斯自己所言，将语言学融于人类学的思路，早在此前的邦凡特（J. Bonfante）、荷卡特（A. Hocart）等学者那里便已有先例，不过他们的实践充其量是用人类学方式研究民族语言学，与列维-斯特劳心目两种学科真正的联姻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音位学的诞生打破

① 例如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

② 转引自茨维坦·托多罗夫：《我们与他人：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法兰西思考》，袁莉、汪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③ 茨维坦·托多罗夫：《我们与他人：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法兰西思考》，第58~59页。

了这一局面”^①，语言学与人类学的划时代跨学科融合契机似乎出现了。

“音位学”（phonology）这一概念，或被译解为“结构语音学”，是俄国语言学家特鲁别茨柯依受索绪尔结构语言学启发，所发展出来的一种全新的语言学理论。在其《音位学原理》（*Principals of Phonology*）一书中，特鲁别茨柯依将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概念纳入语言学概念，从而使索绪尔结构主义观念在语言学领域获得进一步应用。此后，这种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影响到罗曼·雅各布森，使其延续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在其《主导》及与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蒂尼亚诺夫合著的《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等文中，雅各布森明确将索绪尔语言学与俄国形式主义联系起来，指明它对语言学、文学等人文学科的意义所在。

然而，结构语言学真正开始对社会科学产生影响，却与列维-斯特劳斯相关。他在与雅各布森保持亲密交往的过程中，受到了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并创造性地将雅各布森、特鲁别茨柯依等人的语言学思想融于人类学理论建构之中。“社会学家在研究跟亲属关系有关的问题时（也许研究别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发现自己所处的局面跟音位学家十分相似，因为表达亲属关系的词项跟音位一样，都是意义成分，它们照样必须归入系统才能获得意义。”^②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将音位学的系统观引入人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语言现象所做的共时分析，能够使系统内部的语言结构呈现出来，并由“言语”的具体展开来判断作为语言可能性集合的“语言”；而相同的逻辑在人类学领域同样能够得到隐喻式的反向推之，亦即通过对作为“语言”的血亲组织形式可能性的推理，演化出作为“言语”的不同血亲组织形式。

索绪尔指出，在系统之内，能指可以在差异性原则之下获得其所指意义，而控制着这种意义生成可能性的，是系统之后潜藏的“语言”，亦即所有言语行为的集合；但这个“集合”具有怎样的范畴和形态，索绪尔似乎并不关心，从而使得这一概念被形而上学化，与柏拉图的“理式”概念颇为相似。与索绪尔“语言”概念相应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中关于社群组织形式可能性的集合结构。在他看来，语言与血亲结构具有某种形式层面的

^①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张祖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②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第32页。

异质同构性，换言之，语言系统内部语言意义的形成方式，与血亲家族的组织形式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列维-斯特劳斯的基本策略恰恰建基于此：认定作为“语言”的社会无意识能够决定作为“言语”的血亲组织形式，一如能指在“语言”的控制下，获得系统内的所指意义一般。因此，列维-斯特劳斯由此发展出来的结构人类学与索绪尔语言学一样，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体现。

但问题在于，列维-斯特劳斯与索绪尔语言学同样没有对可能性集合结构的问题进行廓清，同时又像索绪尔一样，在结构问题的生成性问题被悬置的状况下谈论言语和血亲组织形式问题，从而使得其理论带上了某种形而上学色彩——“在同一门语言的这些不同的结构模态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关系，某种‘元结构’，它可以被视为模态结构的组合规则”^①，同时却未说明“元结构”的来源。

列维-斯特劳斯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作为其理论的主要来源，以语言学的形式特点和人类社会结构的形式特点之间的异质同构相似性为据，由此将社会分析形式化、符号化，并将之视为一种科学化的操作方式。严格地讲，这一革新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科学式”理论设想存在一定差距。

列维-斯特劳斯宣称将“数理逻辑”运用于对血亲组织形式的推理和判断中，使其理论貌似带上了某种科学色彩。这种数学途径，是在作为血亲组织形式的可能性被悬置的状态下，在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路下被用来探讨各种血缘组织可能性的。例如，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研究某部落的继嗣法则时便能够以公式形式来进行“推算”。^②但是，对“言语”层面的血亲组织形式进行推演，应当在“语言”的形态获得确认的前提下进行，可是列维-斯特劳斯对“语言”的悬置，使得“言语”推演成了一种在其自身逻辑内部进行的数理游戏，这也就使得作为“语言”的组织模型未能真正体现出应有的科学面貌。

众所周知，索绪尔开创了有别于“历时性”研究的“共时性”语言学方法。所谓“历时性”，究其本质在于，从自然及社会等语言外部的现实变动性因素出发，探讨影响语言形成与变化的原因。西方思想家经历过漫长的语言学发展历程，在进入19世纪之后，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威廉·

①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第55页。

②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1），第41~42页。

洪堡（William Humboldt）等西方学者为语言学的科学实证化开启了研究道路^①，此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继承孔德的实证主义方法，语言学的科学研究角度愈益明显。

但这也使得西方语言学界的探讨多围绕着语言学思维及语言学现象的外部生成原因而展开，而疏于对语言自身内部结构的探讨。这一现状令索绪尔极为不满，促使其创造性地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共时性”语言学体系。这一体系认为：语言意义的生成根源，在于语言系统的内部逻辑使然；因此，考察语言学现象的首要维度，应当是摒弃自然、社会等动态因素的影响，而静态地考察语言的内部结构。其中，索绪尔的“差异性”这一至为重要的观念便是在这一理论预设下提出来的：在封闭性的系统之中，能指和所指的“任意性”结合，亦即语言符号意义的产生，必然在该符号排除其他符号占有这一意义的情况下才能完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符号意义的生成性，在于排挤掉其他符号在该系统内占有这一意义的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差异性”更准确的表述应为“排他性”。

就共时角度而言，系统内部的语言符号确实具有某种差异性，但意义的生成是否能够牢固地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使某个符号预先占据某种意义，再使其他符号逐次去占据其他意义，是否可行？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错误地将语言的现实性来源排除在外。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系在其去世后由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和赛切哈耶（Albert Sechehaye）编纂而成，该书是否如实反映了索绪尔的想法，已成世纪悬案。而国内外学界结合索绪尔的其他手稿，对巴利和赛切哈耶版《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索绪尔“共时性”思想提出了越来越严厉的质疑。^②

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当列维-斯特劳斯在形式相似性的意义上，将索绪尔语言系统的逻辑性套用在人类学领域时，他立刻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质料方面的差异，忽视这种差异，便意味着一种对运用假设理论的冒险。诚如法国“发生学结构主义”社会学家戈尔德

^① 详见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一书第7章，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

^② 例如英国学者罗伯特·霍奇（Robert Hodge）与君特·克雷斯（Gunther Kress）合著的《社会符号学》，中国学者胡亚敏《回到索绪尔——“语言与言语”之再辨析》一文，《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等等。